

历史记忆中的精神镜像：马占山与江桥抗战

戴 燕

(青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青海 西宁 810008)

摘要: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马占山领导的江桥抗战,不仅打响了中华民族十四年抗击日本侵略战争的第一枪,而且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这场战役已经超越了一场战争本身所具有的军事意义,而升华为一种团结抗日的民族精神。作为历史存在和历史记忆,无论是政府褒奖还是民间颂扬,也无论从个人抗日决心到媒介报道宣传,马占山这个人物与江桥抗战这个事件,都折射出一种中华民族抗日卫国和复兴图强的精神镜像。马占山所代表的中国军人形象,也镜像为中国军人和爱国民众奋勇抗敌的信念支撑和自我担当的精神对照,不仅激发出民众抗日御敌、保家卫国的爱国情怀,同时也唤起了国民团结抗日、民族复兴的思想潮流。

关键词:马占山;江桥抗战;民族精神

中图分类号:K26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102-(2015)05-0000-00

“九·一八”事变,是中华民族的屈辱,但它也是民族复兴的开始。“九·一八”事变后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激发了人们的民族认同感和历史责任感。马占山江桥抗战,作为中华民族开始武装抗日的标志性事件,已经超越了一场战事本身的意义,而升华为一种团结抗日的民族精神,成为爱国民众增强抗日决心和信心,检视自我担当的一种精神镜像。1931年马占山领导的江桥抗战,不仅打响了十四年抗击日本侵略战争的第一枪,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①,而且马占山抗日精神的引领,对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复兴观念形成产生了积极影响。

—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使得辽宁、吉林两省在数日之间相继沦陷,之后,日军开始进犯黑龙江。由于辽宁、吉林两省陷落,加之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当时在北平,群龙无首的军政两界颇为恐慌。此时洮辽(吉林西北)镇守使张海

鹏又投靠日军,宣布独立,并在日本人策划下准备进犯黑龙江,黑龙江局势极其危急。1931年9月下旬,黑龙江省开始军事布防,“调中东路驻小蒿子站的程志远旅朱凤阳团进驻泰来(黑龙江所属一个县),对洮南方面警戒。派工兵一连驻守江桥,并构筑北岸阵地的据点工事。”^[1]江桥,亦称嫩江桥,1920年修建,位于黑龙江省泰来县东北部嫩江之上,是连接洮(洮南)昂(昂溪)铁路的一座桥梁,当时是通往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的必经通道。10月初,张海鹏军队“突沿洮昂铁路,向前推进,其用意,显系欲以武力夺取省政府”,而“此次攻击,实为日人所煽动”,时任黑龙江省代主席兼东北边防军驻江副司令的马占山将军,“为阻止张军之前进,下令拆毁嫩江桥,两军遂隔河对峙”。^[2]日本人以修复嫩江桥为名,向马占山提出三项要求,要其撤离嫩江桥,退至齐齐哈尔,被马占山拒绝。马氏这种态度,对于日本侵占整个东三省的计划,是一个最大的阻碍。11月3日,日军两列铁甲车和30多名士兵,开到嫩江桥,日军飞机

①参见拙文《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载《青海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

收稿日期:2015-07-15

作者简介:戴燕(1966-),女,汉族,北京人,青海师范大学教授。研究方向:民国史。

向中方军队投掷炸弹。11月4日,日军以飞机为掩护,派兵4千人,在铁甲车和山炮配合下,向嫩江桥和大兴车站发起猛烈攻击。马占山即刻命令守军奋起还击,展开嫩江之战。日军向江桥阵地的多次攻击被打退,又驾百余艘船偷渡而来,亦被击退,马占山下令坚守桥头和江岸阵地,并命张殿九的步兵第一旅南下增援。5日,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第一旅前锋部队适时赶到,守军全体官兵顿时士气大振,与敌反复冲杀,最终将敌击退。据日方发布这一天的战报称,日伪死伤官兵一千三百余人。6日,日军卷土重来,展开更猛烈的进攻,形势异常严峻,马占山立即赶到前线阵地指挥作战,日军损失巨大,调来增援部队。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马占山下令退至距嫩江桥50华里的三间房,并在三间房同日军展开血战。^①

江桥抗战的历史事实表明:马占山率军顽强抵抗日军,打响了中华民族武装抗日的第一枪。从更为宏观的视野来看,也是打响了20世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从1931年马占山领导江桥抗战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华民族经历了长达十四年的、艰苦卓绝的民族自卫战争。日本迅速推进东三省的计划,也被马占山的江桥抗战所打破。本人认为江桥抗战具有三个重要意义:其一,打击了日本的嚣张气焰,使得自“九·一八”以来占领整个东三省的计划似乎在朝向日本的意愿顺利进行之时,给了日本当头一棒;其二,为国人增长了民族志气,唤醒了民族抗日的决心和信心;其三,取得了国际社会和国际舆论对中国的关注,有助于中国在外交事务中占据主动。马占山的抗日决心和其指挥的江桥抗战,已经超出了一场战争本身所具有的军事意义,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段,在国民心理上产生震荡和共鸣,激发了民众的抗日情绪,成为民族奋起自救的一面旗帜,也成为民众自我观照的一种精神镜像。作为历史存在和历史记忆,无论在政府还是民间,从媒介报道宣传到民众援助行动,马占山与江桥抗战,都折射出一种保家卫国和复兴图强的精神镜像,而这种不畏强暴、奋勇抗敌的民族精神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和赞许。

二

笼统地讲,社会历史发展都是由各种事件的发生而推动的。能被历史记忆下来的一定是对某一特定时段的某一人群的生存和生活造成了巨大影响的事件。马占山这个人物与江桥抗战这个历史事件之所以被联系在一起并被历史记忆下来,是因为它是

中华民族武装抗击日本侵略的开始。而江桥事件之所以发生,与其领导者马占山的个人性格和抗日态度密不可分。

马占山性格勇猛,就连日本人也称赞马占山“身不甚高,英姿豪爽。虽貌如书生,而智勇过人。”当时黑龙江的土匪“均畏之若猛虎,视之若神圣。”以致在土匪中流传着“尔等若做亏心事,将来必遇马团长”^[3]这样一种誓约。可见,马占山本人是具有一种英武威严的军人气质的。

从“九·一八”事变到江桥抗战,马占山的抗日态度非常明确和坚决。1931年10月初,在黑龙江局势危急之时,张学良从北平来电,特任马占山代理黑龙江省政府主席兼东北边防军驻江副司令。马占山在黑河接到代职电令后,即率步兵李青山团赶赴齐齐哈尔。20日,马占山正式就任代理主席职务,并在省府礼堂举行就职典礼,与会官员及来宾约三百人,日本驻黑龙江省领事清水八百一也参加了大会。马占山分析目前形势,认为重要任务是维持地方治安,但是他表示:“倘有侵犯我疆土,及扰乱治安者,决以全力铲除之,以尽我保卫之责。”^[4]10月22日,马占山在《抵抗宣言》中再次表达了抗战的决心:“当此国家多难之秋,三省已亡其二,稍有人心者,莫不卧薪尝胆,誓救危亡……尔后凡侵入我江省境者,誓必决死一战。”^[5]

江桥抗战过程中,马占山与时任黑龙江省军事副总指挥兼参谋长的谢珂一同,于11月10日将战斗经过和撤守情形电告南京政府,目的是“将经过本末情形实告中外,以明真相,而定是非”,同时表示“占山等守土有责,爱国心同,早知沙塞孤军,难抗强日,顾以存亡所系,公理攸关,岂能不与周旋,坐以待毙?援田横五百之意,本少康一旅之诚,谨先我同胞而赴国难焉。”^[6]马占山表示“守土系属天职,自卫斯为神圣。”“国如丧亡,家于何有?”“惟望我海内外同胞,共凛匹夫有责之义,群起动员,勿任各个击破,而保我子孙,还我山河。”^[7]

马占山个人不仅表现出坚定的抗日决心,在1932年4月闻知国联调查团将抵东北时,还揭露“日人强奸民意,谓我东北人民自愿脱离中央,以遂其侵略政策而欺骗国联调查团。”4月12日,马占山致电国联调查团,立誓宣告:“我东三省实无一人甘愿脱离本国,自外生存者,即从事于伪政府之官吏,

^①江桥激战经过参见谢珂《抗战史上的光辉一页》,尹秀峰《江桥抗战日记》,载《马占山将军》第30—55页;马志伟《马占山将军传》。

均被监视,失去自由。希望贵团加以实地调查,以作真诚之报告,世界和平,胥利赖焉。”^[8]5月,马占山派姜松年秘密到达哈尔滨,向调查团转达马占山邀请其前往海伦会晤,视察义军情形,了解民众情绪的意愿。调查团欲会晤马占山之事,引起日本政府极为不满,并遭到百般阻挠,最终未能实现会晤。即便如此,李顿还是派了随行的英国记者海米斯和瑞士记者林特冒着生命危险,前往海伦采访马占山,了解有关情况。马占山对会晤国联调查团的积极态度,表达中国人民抗日的决心,目的是要揭穿日本侵略东北的阴谋。

显然,正是有马占山这样一批不屈不挠、抗敌卫国的将士,才有了江桥御敌第一枪的抗战史实。相应的,也正是马占山作为军事将领这样一种誓死御敌的抗日勇气,以及江桥抗战浴血奋战的英勇事迹,使得马占山的名字从一个爱国将领上升为抗日民族精神的象征,唤醒和激励民族的抗日热情,增添了民族抗日的信心和决心。

国民政府对马占山及江桥抗战给予了充分肯定。江桥抗战发生后,国民政府即于十月八日向国联行政院呈文,陈述江桥事件真相,指出江桥事件是“日本之欲以武力占领齐齐哈尔,藉已达到推翻东省北部现有政府,而扶护叛徒之目的。”同时明确表示“黑龙江省政府主席马占山守土有责,对于外国军队之违法及侵略行动,犹如对于盗匪之劫掠行为,有以全力排除之责任。此次马主席指挥其所部军队抵御日军,中国政府认为系属当然之事。”^[9]紧接着在十一月召开的第三届中央第二次临时会议上,国民政府“用全体会议名义,致电奖励黑龙江马代主席占山”。^[10]接下来又在十一月十二日至二十三日召开的“南京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在“对日寇侵略暴行之决议案”中指出“日本以武力侵占我齐齐哈尔,侵占地带愈加扩大。而国际间保障公道之权威,渐有为日本强权屈服之危险,全世界国家所赖以保持和平生存之一切国际公约,行将陷于破坏之厄运。”为了保障国家生存与世界和平,国民政府郑重宣布:“中国黑龙江省政府主席马占山对于日本军队进攻之正当防卫,不独为保障中国国家之领土,尤为保障国际正义与世界和平之存在,亦即为维持国联盟约、非战公约、九国公约及一切国际公约之存在而牺牲。”^[11]国民政府对马占山及江桥抗战的支持,无论在确立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外交态度,还是在激发国内民众增强团结抗日信心方面,都具有积极意义和作用。

三

“九·一八”事变及马占山江桥抗战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对“九·一八”事件性质的认定是判定是非和争取国际舆论支持的重要依据。在国联调查团呈交行政院的报告书当中,第一章就明确指出:“满洲为中国之一部”,认为即使在张作霖统治满洲,“迭次宣布之独立”之时,也“绝不含有渠个人或满洲人民情愿与中国分离之意义”。对于各军阀间的军事争夺,报告书认为“均系一种建立真正强健政府,以图统一全国之野心计划。”“故满洲虽迭经战事及独立时期,但仍为中国完整之一部。”^[12]“中国人民认满洲为整个中国之一部,使满洲脱离中国之任何阴谋,皆在极端反对之列。”^[13]

基于国联调查团的事实调查和客观表述,足以证明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侵略性质及其预谋性,报告书对此也给出了公正的结论:“日方与事前却有充分计划以应付中日间万一发生之战事。此计划于九月十八日至十九日之夜见诸实行。”^[14]报告书对马占山江桥抗战做了详细描述,指出“马占山,丁超,李杜三氏,以其继续抗日故,在中国颇享令名。”^[15]

不仅如此,“美国驻华武官也鄙视中国不抵抗,而为马占山喝彩,赞扬十九路军的抗日,认为表现出来的战斗意志,足以赢得中国抗日的最后胜利。”^[16]这都证明马占山江桥抗日是正义之战,而这种正义之战所表现出的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民族精神和战斗意志,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赞许。

马占山的抗日决心和江桥抗战事迹是通过媒介传到民众心中并产生影响的,成为增长民族信心,团结抗日的一面旗帜。报刊作为当时唯一的媒介形式,对新闻焦点和热点的报道,既反映出一种社会关注,同时也在提炼和形塑一种精神和价值观念。“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亡成为当时各大报刊关注和发表时事评论的重点,马占山及江桥抗战事迹当然成为了报刊聚焦的对象。1931年11月17日《滨江时报》以《马占山万岁》为题发表评论:“东三省已经版图变色了,中国的军队所蒙的耻辱是何等重大。但是马占山还只有一个。”而马占山“是足以当中国军人四个字而无愧”。这篇评论不仅抒发了对民族英雄的敬仰之情,也发出了鼓舞士气的吼声:“中国军人马占山先生,你鼓着勇气,撒着热血,在这白山黑水之间,孤军苦斗,你的英武,是值得四万万同胞敬仰,……最后我们高呼着:中国军人马占山万岁!”^[17]

上海《生活》周刊杂志先后刊登了《我们何以尊崇马将军?》《奋斗精神的表现》《为民族争光的马占山将军》《民众爱戴的卫国军人》等文章,邹韬奋赞扬马占山将军及东北抗日义勇军将士“保卫国土、宁死不屈的精神,实为中华民族前途生路之所系,使世界知道我国军人非尽无耻,为民族争回不少光荣。这样忠勇的卫国军人,固非枉死于内战的傀儡军人可比,亦非他国以侵略别人国土的暴虐军人可比,全国国民对于这种卫护民族保全国土而不畏自我牺牲的模范军人,实应与以一致的感谢表示与鼓动。”^[18]

《申报》记者采访马占山,在谈到江桥抗战张景惠劝马占山与日方会晤时,马占山称“惟马占山自信系一好男儿,绝不降日”,“为亡国奴支配下之亡国奴,吾绝不干,吾惟有拼命到底。”^[19]为此,《申报》评论马占山“以一旅之众,首赴困难,为国家保疆土,为民族争光,实为将吏之楷模、民族之表率。”^①

各国报纸对日本占领东北,也纷纷发表文章予以谴责,对马占山等抗日义勇军的抗日精神给予赞许和鼓励。美国《世界新闻社》翻译发表 Victor France 的通信:“目下东省所遭之事变,其意味即为日本已决计图并吞东省,彼之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处心积虑,由来已久……若中国天产富饶之三省,竟变为日本殖民地,则欧战后于国际间确立一种新道德之努力,将尽成泡影……若任彼侵略他人,以取之所需,不加阻止,则世界他国之将来发展,必遭一新危险无疑。”^[20]大美晚报社评认为“马占山既不畏强敌,挺而应战,虽未与日本全国较量,亦已与一部分日军交绥,而一显其好身手,吾思马氏此次可使日帝国支出一笔巨额库币也。”^[21]英国路透社、《泰晤士报》苏联《真理报》《普拉夫达报》,法国、瑞士等欧洲国家也都发表评论,对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进行抨击。^[22]这些评论不仅是人类正义和平的呼声,而且给予了中国人民道义上的帮助。

马占山及江桥抗战事迹对海外留学生和海外华侨也产生了影响,成为他们心目中敬仰的民族英雄。在比利时有一名叫苏汝霖(R.S.orelle)的华人“极痛恨此次日本人之暴行,对马占山将军之抗日,极为敬仰”,并随身携带马占山将军的相片,称马占山“中国之伟人也”。^[23]

1931年11月17日上海《生活》周刊刊登了一篇中国留美学生发美国的通讯写道,美国报纸以“中国将军对日宣战”、“中国人痛惩顽敌”、“中国军队大败日军”为题报道马占山江桥抗战的消息,当其他国家留学生得此消息向其握手道贺时,这位中国

留学生深深感到“两个月来(自“九·一八”以来——作者注)含羞的悲愤生活,竟于一朝之间略得洗涤,这种精神上的安慰,真非言语所能形容。”这位留学生还摘抄了当时在纽约、芝加哥、旧金山的华侨团体给马将军的电文:“仰公忠勇为国,孤军杀敌,薄海内外,仰若泰山。”“贵主席精忠为国,华侨感戴,当节衣缩食,为公后盾。”“我公奋起杀贼,为中华民族争人格,世界人民争正义,友邦敬佩,日贼心寒,愿再秣马厉兵,扫灭丑虏,克复国土,荣戟东京。”留学生还写道:“我们中国因为有了这么一个马将军,顿使被人讥为缺乏军人资格的中国民族,放出异彩,顿使世界各国对于中国民族之观感为之一变。”感叹马将军的事迹“怎能不使海外闻风感激流涕呢!”并为马占山让海外华人扬眉吐气而发出“马将军真不愧为中国男儿!”的赞扬。^[24]

国民政府的嘉奖与赞许,报刊舆论的宣传与引领,使得民众的抗日热情不断高涨,人们以各种方式表达对马占山的敬佩和支持。爱国志士皮侠鸣在江苏海门创办《救国专刊》,发表田少常的文章《我们的东北义勇军》,文中写道:“在九·一八以后,日本人毫不费力的侵占了我们三省,正在趾高气扬的当儿,马占山将军的嫩江桥一击,使得兵精械强的日本队伍,狼狈逃溃,东北义勇军的声色,便从战慄的日本人心,一直透到全世界上。”^[25]

福昌烟草公司特制“马占山牌”香烟,包装盒上印有马占山将军头像和“忠勇为国”四个字,该公司在《申报》上做的香烟广告词为“愿人人都学马将军”。

著名的教育家、文学家陶行知先生在其创作的《敬赠马占山主席》一诗中,盛赞马占山:“神武将军天上来,浩然正气系兴衰。手抛日球归常轨,十二金牌召不回。”^②

上海音乐家协会还专门为黑龙江守军谱写了《马家军之歌》,马占山的名字随着动听的歌声传遍了大江南北。

综上所述,马占山和江桥抗战,已不只是一个人物,一个事件,而是以英勇抗日的军人形象存在着的一种民族精神的象征。在当时那个民族危亡的特定时期,马占山所代表的中国军人形象,已经镜像为中国军人和爱国民众的信念支撑和自我担当的精神对照。这种精神镜像不仅激发出民众抗日御敌、保家

① 参见《中报》1931年11月18日。

② 参见上海《生活周刊》,1931年11月17日。

卫国的爱国情怀,同时也唤起了整个民族团结抗日、民族复兴的时代潮流。

参考文献:

- [1][6]谢珂.抗战史上的光辉一页[A].马占山将军[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26;34.
- [2]国联调查团报告书[A].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230)[Z].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218—219.
- [3][日]田也种治郎编,东三省官绅人民录[M].台北:文海出版有限公司,民国六十二年二月.696.
- [4]徐棻.马占山将军抗日战[M].北平:中北印刷局,1933.10.
- [5]国民党高级将领列传[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7.
- [7][8]马占山电文选登[A].马占山将军[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146—148;154.
- [9][21][22][23]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223)[Z].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207—212;67;73—161;158.
- [10][11]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中央党务月刊,第四十期,1931.载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19;37—38.
- [12][13][14][15]国联调查团报告书[A].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230)[Z].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115—116;140;215;239.
- [16]汪荣祖,李敖.蒋介石评传[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2004.294.
- [17]《滨江时报》评论员.马占山万岁[A].马占山将军[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65—66.
- [18]韬奋.为民族争光的将军[J].生活,1931,6(47).
- [19]《申报》记者.海伦访马记[A].马占山将军[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64.
- [20]日人侵略东省危及全世界[A].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223)[Z].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46—47.
- [24]仲雨.名满全美的马将军[J].上海《生活》周刊,1932,7(1).
- [25]少常.我们的东北义勇军[A].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286)[Z].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31.

Mirror Image of National Spirit in Historial Memory : Ma Zhanshan and Jiang Qiao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DAI Yan

(*Humanities College of Qinghai Normal University, Xining 810008, China*)

Abstract: On 18th, Sep, 1931, Japanese militarists engineered a Blitz occupation of Shenyang, overrunning the whole of the China's Northeast in three months. Against the global defeatist backdrop, Ma Zhanshan, a nationalist general, led his troops and routed Japanese aggressors at Jiangqiao. In hindsight, Jiangqiao Incident turned out to be the first shot of China's 14 year odd anti-Japanese war as well as arguably that of worldwide effort to stall and ultimately quash the march of fascist forces to engulf the entire human communit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global impact and significance of Jiangqiao Incident and its mastermind General Ma Zhanshan, by far much neglected and deplorably under-researched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Key words: Ma Zhanshan;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National spirit